

吳永章著

黎族史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13660

吳永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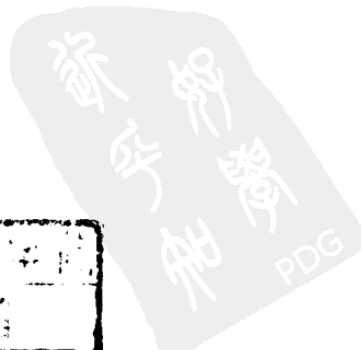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黎族史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责任编辑:林秀钰

封面设计:智 达

黎 族 史

吴永章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岭南文化发展公司照排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厂址:韶关市工业东路33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75印张 350000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218-02444-0/K·564

定价:平装27.00元 精装37.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选平 卢钟鹤 任仲夷 杨应彬 杨资元
李兰芳 陈越平 林 若 黄文俞 黄华华
谢 非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黄 浩
主 编：于幼军
副主编：刘斯奋 岑 桑 (执行) 萧如川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卞恩才	冯伯秋	庄 昭
刘扳盛	刘斯奋	朱仲南	麦英豪
李 翀	李权时	李达强	李锦全
岑 桑	张 磊	陈俊年	陈海烈
陈胜彝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芑子
梁 钊	梁渭雄	萧如川	曾牧野
曾宪志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19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20世纪80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

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源远流长的黎族

——序《黎族史》

王学萍

黎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和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族。黎族族源问题是黎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近年来在繁忙公务活动之余，偶读史书，引发了自己对黎族历史的兴趣。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吴永章约我为他的大作《黎族史》作序。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对黎族族源的一点认识，算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关心和研究这个问题，并在不久的将来对黎族族源问题能够形成共识。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考古学界在海南发现含有石器的古遗址洞穴、岗丘、沙丘、贝丘有200多处，这些遗址广泛分布于海南岛各地。从发现的石器和陶器分析，在距今六七千年到三四千年间，海南不少地方已有人类的活动。特别

是“三亚人”的发现，又把海南的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1万年左右。1992—199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及海南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在三亚市东北郊落笔洞洞穴遗址发现了1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化石及伴生的石制品、骨制品和角制品等大批文化遗物。遗址中灰色胶结层堆积物经碳14年代测定为 10642 ± 207 年。由此可见，从1万年前到3000年前，海南岛各地一直有人类的活动。那么，这个时期的人类是否就是黎族的先民呢？就我个人的观点，“三亚人”及后来在海南岛活动的人类应是黎族的先民。根据有两点：其一，在海南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文化遗物基本上属于百越中一支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在石器方面，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铤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陶器则包括夹砂粗陶、泥质细陶和印纹硬陶三种陶系。常见于粤中地区的夔纹硬陶则少见。在广西东兴临海河口、南宁邕江及其上游，左右江流域扶绥、邕宁、横县等14处贝丘遗址都发现了与海南岛型相似的石器工具、网坠等，说明海南岛新石器文化与两广地区的骆越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其二，骆越当是黎族先民。关于第一点理由，学术成果较多，意见较为一致，此处不再多证。现重点讨论一下骆越为黎族先民之说。

从历史地理学上看。骆越又作“雒越”，《史记·南越列传》但称为骆，“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以今日地理范围，赵

它所据的南海、桂林、象三郡，当为广东、广西、越南等地。汉武帝平定南越，在越人故地开置九郡，儋耳、珠崖二郡在海南岛，自然是越地一部分。那么，海南岛居民究竟是越人之中的哪一支呢？《汉书·贾捐之传》有明确记载。汉元帝初元年间（公元前49年—前45年），珠崖“反叛”，朝廷议征讨之事，贾捐之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本不足郡县置也。颡颡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上文骆越之名，是在文献中首次出现，在这里是指海南岛土著居民。《资治通鉴·汉纪二十》胡三省注曰：“余谓今安南地，古之骆越也。珠崖，盖亦骆越也。”又据《史记·南越列传》索引引《广州记》，也说骆越在交趾。因而，从地理上判断，骆越分布约相当于越南北部及粤桂与越南交界地区以及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

自东汉以后骆越地带居民名称有较大变化。《后汉书·南蛮传》载：“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其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曰：“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这是关于俚人或里人最早的文献记载。从里人（俚人）居于九真徼外观之，应属西汉骆越遗裔。另据万震《南州异物志》、《旧唐书·地理志》等书记载，在广东西江，广西浔江、郁江以南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其土著居民自东汉以至南北朝，皆称为“俚人”或“俚子”。这一地区，西汉以前为骆越地带，不是因居民迁徙变化，而是因为东汉以后已由骆越改称“俚”的缘故。黎人是由俚人演

变而来，学术界没有异议，无需进一步论证。

从以上论述可知，海南岛西汉以前为骆越一部分，而东汉以后，骆越故地土著改称“俚”，海南岛又为俚人的一部分，后来居住本岛的俚人再改称为“黎”。

从语言学上看。黎语与古越语在语法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特点，如修饰语放在中心词之后的结构方式。东汉袁康《越绝书》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朱余”是由两个名词结合而成的合成词，后者修饰前者。这正是黎语语法的主要特点，“虚上而实下，如鸡肉曰肉鸡，县前曰前县”。黎语在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表现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共同的特征。在语音方面，声母比较简单，韵母比较复杂，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辅音起头的声母，没有真正元音起头的音节；现在壮侗语族分四个调类，八个声调，并与声母的关系比较密切。在语法方面，语序基本与汉语相同，但定语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后，如“白马”说成“马白”，“桃树”说成“树桃”等。在壮傣、侗水、黎三个语支的基本词汇中有不少是同源词，如水、火、子女、鸡、臂、来、狗、猪等，都是同源词，其声母、元音、韵尾都对应，调类除个别例外基本相同。不过黎语从“原始壮侗语”分出来要早些。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黎语既然与壮侗语族各民族语言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可以推定黎族与壮、布依、傣、侗、水等民族有着共同的族源；而目

前学术界绝大多数都认为这些民族起源于古代的越族，那么黎族源于古越族的一支也是顺理成章的。

从地名学上看。地名在最初命名时跟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有关，而且地名的历史比文字的历史还要久远。因此通过华南地区某些地区分析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阐明古代黎族的分布情况以及黎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在同一条目中又提到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南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以近人研究，这些地名都是根据壮侗语族读音，用汉字音译而成。如壮语称稻田为“那”，壮语、黎语均称水为“南”（或作“浦”），黎语称村庄为“抱”、“包”、“番”，称稻田为“打”等等，语言的相近，反映了民族的亲缘关系。据统计，这些地名以“那”字最多，分布集中，广西有 1200 多处，越南有 60 多处，云南有 170 多处，广东有 150 多处。可见，海南岛许多黎语地名与广西、广东高雷等地不少地名在语音和语义方面非常接近或者相同，完全属于壮侗语言系统。

从民族学上看。古越人在生活上、习俗上的主要特点是：断发文身，契臂为盟，多食海产，善使舟及水战，善铸铜器等。这些习俗黎族基本上都有。《水经注》转引晋代王范的《交广春秋》，就曾提到当时海南岛上的土著居民有“披发文身”的习俗。宋代《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对黎族妇女文身有更详细的记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黎族

妇女中仍保留着这种习俗。巢居，是指干栏式建筑，宋《太平寰宇记》中就有黎人“巢居”的记载。这类房子解放前在白沙县南开一带还有保存。在壮、傣等民族中干栏式建筑也很普遍。在婚俗方面，黎族和壮、侗等民族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黎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活动和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的地方。此外，《汉书》等都有关于越人“鸡卜”的记载，而该习俗直到解放前在黎族群众中还完整地保留着。

综上所述，黎族与各壮侗语族各民族在族源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先民与古代生活在两广地区的古越人，以至后来的俚人有密切的关系。而根据考古资料判断，黎族先民——骆越人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交便在海南岛居住，距今至少已有上万年的历史。黎族既是海南岛上的最早居民，也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王学萍,黎族,现任中共中央委员,海南省委常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前 言

黎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是海南岛的土著居民。从远古以来，他们就生息繁衍在这美丽富饶的宝岛上。据 1990 年统计，黎族人口共有 110 多万人，主要聚居在今海南省的三亚市、通什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市、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此外在北部的万宁市、儋州市、屯昌县、琼海市、澄迈县等地也有黎族分布。黎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黎语支。

黎族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据考古材料推知，早在 1 万年前，海南岛已有人类活动。约在 3000 年前的商周之际，黎族先民就已定居在海南岛。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地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达 130 多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靠近河流的山岗和台地上。出土的器物有：石斧、石

斧、石铲、石凿、石戈、石矛、石犁等生产工具，石制和陶制的纺轮，大量陶制的生活用具，以及各种石、陶制成的装饰物等等。大量黎族远古祖先遗物的出土，为研究黎族原始社会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依据。在周、秦时期，我国古籍就有关于黎族先民的种种记载，称作“雕题”、“儋耳”或“离耳”，“穿胸国”或“贯胸国”等。这些传说的、历史材料表明，黎族先民早已与祖国大陆发生了密切联系。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统一岭南广大地区。从此，汉族移民开始陆续入岛，黎、汉人民一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辛勤地开发和经营海南。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 年），正式在岛上设置珠崖、儋耳两郡。郡县制在海南的建立，巩固了祖国的统一，是一重大历史事件。从此，黎族原始社会逐步瓦解，封建化过程开始出现；海南与内地的联系，黎汉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则日益增强。其后，封建王朝在海南的建置，时并时废，管辖范围也有所扩大或缩小。梁大同中（540—541 年），儋耳黎族先民 1000 多峒“归附”冼夫人，由她“请命于朝”而重置崖州。冼夫人是杰出的“南越首领”，当时她管辖的地区包括广东的西南部、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岛。从此以后，历代中央王朝都有效地统辖着海南，海南与内地连为一体。冼夫人在海南地区和黎族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唐代，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有二：一是唐贞元五年（789 年）以后，在海南设置琼、崖、万安、儋、振五州二十二县，为后代的行政建制奠定了基础；一是琼管诸州六十二峒

均已归附，标志着中央王朝势力日益深入黎区。这一时期，黎族地区已出现“以富为雄”、“豪富兼并，役属贫弱”的阶级关系。宋代，黎区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封建化程度也有所加深。宋代，在黎族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唐以前长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入宋后则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元代，最突出的历史现象是，黎族土官势力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清两代，黎族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远离汉区的山区腹地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生产方式的残余外，在靠近汉族的黎族地区，生产发展水平已与当地汉族趋于一致，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已占据统治地位。

黎族是有璀璨而独特文化的民族。黎族手工纺织品，早在宋代，已以其制作精良、细密莹白、色彩鲜美、图案新颖、品种繁多而闻名于世。计有：用纯棉织成的“黎布”与“黎毯”；取内地所产色丝加棉纱织成的“黎幕”；用青红色丝间棉纱制成的卧单名“黎单”；有五彩纹图并联幅为幕者称“黎饰”，此即后世之“黎锦”；五色的短块装饰品为“鞍搭”；上织细字花卉被称作“最上品”的白氍布；以及“花被”、“幔布”等等。黎族的纺织工具与技艺，在宋元之际已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其时，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对此加以总结、改进、推广，促进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飞速发展。长靶短刃、织细藤缠靶的黎刀，在林林总总的南方诸族刀类中独具一格。无羽、弓短、矢重的黎弓，被誉为黎人之“长技”。用特殊材料和方法酿成的美酒，别具清醇之味。为宋

代中原名士乐道的有：“味美香”的安石榴花酒，“醜翻白”的椰酒和“琥珀红”的银皮酒。黎族人民世代培育的优良农作物品种，如“粒大色白，味颇香美”的黎米，“体重盈钩，质皎若霜”的薯实山药，为人们提供了精美食粮。乐器中，铜鼓、铜锣为世所珍。铜鼓，黎族曾在历史上广为使用，其纹饰遗存至今在器物中仍处处可见。铜锣以蛤锣“最贵”，可谓价值连城。黎歌、黎舞，以其特有风韵，为世人所推崇。这一切，都为祖国绚丽多彩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异彩。

黎族是不畏强暴、有英勇斗争历史的民族。汉武帝末年（前 87 年），黎族先民为反抗珠崖太守强征广幅布而进攻郡城，开创了海南人民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展开不屈不挠斗争的先河。唐乾封初年（666—667 年），黎族人民攻陷琼州。有宋一代，黎人反抗活动共达 14 次之多，其中尤以政和八年（1118 年）黎人王居想、绍定四年（1231 年）琼山黎人王居起，端平元年（1243 年）黎人的反抗斗争，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巨。元代，至顺元年（1330 年）至元统二年（1334 年）爆发了以王官福、王六具、王吾、王马、王周、王奴罗诸人为领袖的历时 5 年之久的黎民大起义。明代，黎民反抗斗争，空前繁多。其中较大规模的有 5 次：弘治十四年（1501 年）儋州七方峒黎符南蛇起义；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1539—1541 年），万州和陵水峒黎那黄、陈那任起义；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崖州峒黎那燕、那牵、符门钦起义；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597—1599 年），以琼山县峒黎为据点，以定安县马矢为首的起义；万历四十

一年（1613年），崖州黎那阳、那牙、那定起义。需要指出的是，符南蛇起义，因“官役频繁”而发，事起后“三州十县诸黎峒”纷纷响应，“众号十万”，“撼动海外三千里”，给明王朝在海南的统治予重创，在黎族反抗斗争史上写下光辉一页。清代前期，以康熙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699—1700年）琼山县指马峒首王振邦领导的反对统治者穷征暴敛的反抗斗争较富代表性；清代后期，较著名的有：道光九年（1829年）黎亚鸡和张红湏、张亚基先后领导的崖州黎民起义，道光十三年（1833年）黎亚义领导的儋州黎民起义，特别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爆发的临高和儋县黎、汉人民大起义。鸦片战争后，黎族人民在坚持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又掀起了反帝斗争高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吕那改等人领导4000多黎族农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一切，都构成了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的一部分。

近代以来，黎族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江应梁、岑家梧、刘咸、王兴瑞、容观夔、刘耀荃诸先生是其中佼佼者。本书的撰写，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谨致谢忱。

中共中央委员、海南省委常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萍同志，百忙中抽空为本书作序，以示对黎族研究的支持和鼓励，至为感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海南省民族宗教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1996年本书稿送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审订，并在海口召开了专门讨论书稿的会议。他们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